

# 天爵尊榮、流徙一生——記華人首二位樞機

陳方中 2012.7.17

## 一、田耕莘樞機的教會背景

田耕莘樞機 1890 年生於山東陽穀縣的張秋鎮。陽穀縣在聖言會士於 1882 年來到時，只有坡里庄一處老會口，有教友一百五十人，意即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沒有教友的。田耕莘的父親田開來是秀才，1897 年後在坡里庄小學教書，一段時間後領洗成了教友，但很快的田開來在 1899 年去世，此時田耕莘尚未受洗，要到 1901 年或 1902 年，田耕莘才領洗成了教友。1904 年這位新教友入了兗州的教區小修院，在修院讀書時，田耕莘的成績尚可，但身體不佳，經常感冒生病。到了念哲學時，更是得了肺癆。神學課程差不多時，院長維昌祿神父 (Georg Weig) 在 1916 年命他回家養病，意即不會升神父了，但因中國在 1917 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德國是交戰國，德籍聖言會士處境不明，這位返家養病的修士才在 1918 年 6 月 9 日升了神父。

這位新神父從副本堂開始做起，單縣、沂水縣王莊、汶上縣、鉅野縣、單縣黃岡集、諸城縣、范縣、魚台縣等地，他的肺癆似乎已不再困擾他了。由於工作勤勉認真，也由於他與鄉下教友互動良好，他很快升任本堂，兗州主教韓寧鎬對他日益重用，讓他擔任更多繁重複雜的工作。1928 年已經三十八歲的田耕莘申請加入聖言會，當時的國籍聖言會士不多，因為從 1923 年聖言會才對中國修生開放。1929 年初田耕莘正式開始聖言會的初學，在初學院中有德文的教學，但「田神父未能把德文學好，一則是他缺乏語言天才，二則是他對德文不感興趣。」終其一生，與外國神職交換意見時，田樞機通常是用他流利的拉丁文。1931 年 2 月他結束了初學，在聖言會內宣發了初次聖願。四十歲的田神父繼續他的堂區傳教工作，日後為他寫傳的楊傳亮神父認為，這兩年入聖言會的初學，「使這位已屆不惑之年的田神父，毅力更強，智慧豁達，做事更為謹慎。」

1926 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為六位中國主教祝聖，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，設立國籍代牧區及監牧區，成了教廷的既定政策。聖言會傳教的山東南部地區，雖然多半是新教友形成的會口，但已有三十多名國籍神父，足夠運作一個新的國籍傳教區了。1932 年 2 月，山東西部的陽穀、壽張、濮縣、范縣、觀城、朝城六縣設立自治區，7 月韓寧鎬主教公佈了田耕莘神父為此自治區的負責人。其實在確定田神父之前，韓主教詢問了陳咸德及趙秀文兩位神父擔任教區長的意願，

但兩位神父都拒絕了；田神父原本也不想答應，他認為自己臉上有癬斑不夠體面，他的天資中等又不精通外文，他年幼喪父算是孤兒。<sup>1</sup>……但這些理由韓主教都沒接受，於是田神父在教宗駐華代表剛恒毅所發的委任書上簽了名。1932 年年底，陽穀監牧區成立，1933 年 2 月發表了田神父為監牧，但是沒有主教頭銜。在監牧區內除了兩位國籍聖言會士、六位教區神父外，一開始也有三位外籍聖言會士，但不久後只留下一位陶嘉祿（Karl Teufer）神父，在當時的氣氛中，這是一位很謙虛有聖德的外籍傳教士。

日後一些與其工作過的聖言會士，都津津樂道於田神父的腳踏車。現在的人必須理解，在當時的華北基本上沒有柏油路，在崎嶇不平或雨後泥濘的黃土路上騎腳踏車並不輕鬆。擔任監牧後的田神父並沒放棄這個「樂趣」，經常輕車簡從四處奔走。陽穀監牧區也是一個窮困的華北農村地區，旱災、水旱、蝗災持續的發生；區域性的土匪作亂週期性發生，這些土匪還三不五時綁架神父，意圖勒索贖金。即使是在這樣天災人禍的情況，即使是只有十來位神父，要負責照顧一萬多教友，到 1937 年時，教友人數已從一萬三千七百人，增加到一萬七千六百人，同時在坡里庄還有七十位小修生，在兗州有十九名念哲學或神學的大修生。隨即中日戰爭爆發，但陽穀監牧區仍有正向發展，1939 年的教務統計，陽穀代牧區有兩萬零七百多教友，望教者有約七千三百人。就在這一年陽穀監牧區升格為代牧區，田神父也被賦予主教頭銜，庇護十二世效法前任教宗故事，要親自在羅馬為這些本地主教祝聖，田神父也被教宗選中。田神父往羅馬的旅程少不了許多波折，但他幾次化險為夷，1939 年 10 月 29 日由庇護十二世在伯多祿大殿祝聖為主教。這是田耕莘與庇護十二世的特別情誼。

1940 年 3 月回到陽穀代牧區的田主教，繼續騎著他的腳踏車，面對著日益增加的教會成員，以及持續不斷的天災人禍。或許天災人禍也是教友人數飛快增加的原因之一。1942 年 11 月田主教獲得了青島代牧主教的任命，這是因為前一任德籍主教維昌祿在 1941 年去世，在交戰狀態的中國，不適合任命一位德國主教。在考慮了十三個月之後，教廷決定召田耕莘繼任。這時的青島代牧區由日人佔領，又不時有國共兩方遊擊隊在城鄉間活動。在他轄下是三十餘位外籍聖言會士，四位國籍神父。與神父及聖神會修女的溝通及派遣，可以想像有許多困難。但樸直幹練的田主教，成功的管理著新的代牧區，繼續騎著腳踏車奔行於丘陵平原間。

---

<sup>1</sup> 認識田樞機的人都知道，他臉上時常是紅一塊、白一塊；另外當時教會選擇神職人員時，經常不考慮孤兒身份者，多半希望來自於老教友家庭。

## 二、于斌樞機的教會背景

于斌於 1901 年生於黑龍江省蘭西縣，當時這個關內移民家族尚未接觸到天主教信仰。他的父母早逝，由祖父母撫養長大，在 1913 年或 1914 年移往海倫縣的海北鎮。這個鎮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陸恒厘神父募集捐款購買土地，憑空而起的一個集鎮，很自然的吸引了貧困的于家前往開墾，也很自然的使于家在海北鎮領洗信教。

于斌自小即顯現出他的天資聰穎，但這不足以讓神父們將其納入神職的培育體系中，他是一個十三歲才領洗的新教友，信仰需要更多的培養。在海北鎮神父們的規劃中，聰明的于斌適合在教會外圍工作，也就是讓他去念師範學校，以後回來教書。1919 年在齊齊哈爾念師範學校的于斌碰上了五四運動，全中國的學生都在遊行抗議，齊齊哈爾師範學校的學生也不例外，而于斌在這些學生中很自然的成為領袖。搶眼的學生領袖接下來成為軍閥政府注意的目標，為避其鋒，于斌回到海北鎮，不久他就向本堂神父提出了修道的申請。

他的家人不贊成他修道，因為已經幫他訂了親；神父們也不確定于斌是否一時衝動。在觀察數個月之後，于斌在家中得到了祖母的支持，神父們也確認了于斌的修道渴望，於是讓他進了吉林的神羅修道院。與其他小修生相比，于斌程度高出一大截，學習拉丁文又非常快速，修院的院長認為不應埋沒人才，於是送他去上海的震旦學院。他在震旦學院將法語修習的非常流利，兩年半就學成返回東北。此時教宗駐華代表剛恒毅鼓勵各代牧區遣送優秀修生至羅馬念書，表現優異的于斌修士就在 1924 年赴羅馬傳信大學繼續培育。

于斌在羅馬很快就適應了，他在 1926 年 10 月 28 日六位中國主教的祝聖禮中，擔任了成和德主教的協助者。然後在 1928 年 12 月，晉升為神父，相信這時他的義大利語也很流利的。1929 年秋天，他開始任傳信大學中文教授，1931 年至 1933 年兼管梵蒂岡圖書館中文圖書。于斌曾在 1929 年參與梵蒂岡至阿比西尼亞的外交訪問，因表現得體，當時的教廷國務卿巴切里樞機（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），也就是日後的教宗庇護十二世，曾詢問于斌加入教廷外交官行列的意願，于斌婉拒了，他修道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中國教會。

在中國鞠躬盡瘁的剛恒毅，在 1933 年返歐休養，他也認為于斌是中國教會的明日之星。經由剛恒毅的推薦，于斌以公教進行會總監督及教宗代表公署秘書的身份，返回中國。首先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工作，因此于斌不用回到他原屬的吉林代牧區服務。其次公教進行會是一種推動教友加入福傳行列的組織，是推動本地化教會不可或缺的環節。于斌風塵僕僕的在中國各代牧區成立公教進行會分會，很多教會人物都記得這時于斌神父的風采。田耕莘監牧也在 1935 年，在兗州的

一次會議上，第一次看見了宣傳公教進行會的于斌神父。田監牧在 1935 年 9 月，也到上海參加公教進行會代表大會，這是一個千人參加的大型活動，展現了于斌神父的組織能力及魅力。

南京代牧區在 1933 年劃分為上海代牧區及南京代牧區，舊南京代牧區主教惠濟良（Augustinius Haouisse）接任上海代牧區主教，新南京代牧區主教則一直懸缺。教廷在 1936 年將這新的南京代牧區，宣佈由于斌擔任主教。南京代牧區包括原代牧區西部十五縣，其中教友較多在無錫、江陰、丹陽等縣，教友共約三萬人。很特別的是，于斌祝聖主教的典禮是在北平的救世主大堂（北堂），在 1936 年 9 月 20 日由第二任教宗駐華代表蔡寧（Mario Zanin）主禮，公教進行會的各支會代表參加非常踴躍，教外的社會名流也多人前來，連同本地神職、修女、教友，共有三千多人參加。這個盛大的典禮選在北平由蔡寧主持，代表著于斌不只是一個新的國籍代牧主教，他更是中國首都主教。

在于斌主持的南京代牧區沒有教友大量增加的報導，最主要原因是對日抗戰的迅速爆發，這位首都主教在愛國心的驅使下，對南京代牧區發佈了牧函，這實際也等於是對全中國教友的牧函。牧函的名稱是〈為蘆溝橋事件告南京所屬教胞書〉，內容的重點有二：祈禱和平；準備應戰。1939 年「香港公教真理學會」還出版了《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》，由此可以看出于斌在國家問題上的看法。

于斌對所謂「政治問題」的看法，是與大部份主導中國教會的外籍傳教士有差異的，這些傳教士多半用「不干涉政治」或「中立」表達立場，但在這些說法後面，實際上他們仍有立場。無論如何，既然中立，一些外籍傳教士就認為于斌政教不分。另一方面，國民政府也發現了于斌的愛國心與能力，據說蔣委員長就稱于斌是「我們的主教」。

這位「我們的主教」在抗戰時期做了兩件在教會內被議論的事。第一是協助國民政府從事所謂的國民外交，國民外交具有私人性質，經查一些信件檔案，其實于斌從事這些民間活動，背後是有政府資金補助的。但這個舉動引起的議論是有正反面的，教廷中也有于斌的支持者，甚至教宗庇護十一世及接任的庇護十二世，都沒有批評過于斌的愛國行動。第二是在第一次歐美國際外交活動後，于斌在 1938 年 7 月返國時，沒有回到南京，而是到了國民政府所在的漢口。以後當國民政府遷往重慶，于斌主教也在重慶設立了辦事處。這時的于斌因其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，不回到日軍佔領的南京是合理的，可以說他是流亡的主教，也可說他是戰時政府的首都主教。

于斌是推動中梵建交的熱心人士，從 1937 年他第一次進行國民外交時，他就積極探詢國民政府派遣使節駐教廷的可能性，但當時僅是紙上作業，意見徵詢

而已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，日本為增加外交奧援，開始尋求與教廷建交，精於外交的庇護十二世為維持教廷的中立立場，沒有忘記中國教會方面長年建交的想望，遂通知國民政府可開始商議建交事宜。終於在 1942 年 6 月國民政府宣佈與教廷建交，1943 年 1 月首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抵達梵蒂岡。在整個過程中，于斌扮演國民政府與教廷間溝通者的角色，盡力促成其事。

抗戰時期的于斌主教，有四次往歐美從事國民外交。他在美國東岸的紐約開辦了《英文中國月報》(China Monthly)，後期又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了「中國文化學院」(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)。總計八年抗戰期間，他在歐美各地大概有接近一半的時間。在國內時期主要駐紮在重慶，他將已在天津停辦的《益世報》先在昆明恢復，以後轉至重慶繼續。輔仁大學校史室藏有若干期《重慶益世報》，因經濟條件所限，這份報紙的紙張非常粗劣。教廷也同情于斌不能返回南京代牧區的處境，在 1944 年命他署理四川的嘉定代牧區。

### 三、田耕莘樞機主教

1943 年 10 月教宗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接見了謝壽康公使，與其長談一小時，「希望中國勝利後，雙方關係更臻密切。」將來中國主教，改由中國司鐸升任。」這次談話代表庇護十二世已預測大戰將由同盟國一方獲勝。由於庇護十二世態度的轉向，于斌 1944 年 9 月往訪教廷時，教宗對于斌也表現出相當友善的態度，就在這一次訪問時，于斌和謝壽康談及中國樞機主教的可能性。雖然樞機主教只是榮銜，在實際權力上與一般主教並無不同，但在其本國教會，常是一國教會之首席，且此時亞洲各地教會並無樞機，若在其中任命一位，毋寧是二十世紀教廷持續推動建立本地主教，再一次的象徵性行動。

選任樞機是教宗特權，但實際上教宗也仰賴一些教廷官員協助，設法在各方考慮中尋求最適當人選，因此熟知教廷運作的于斌，知道其中是有遊說空間的。這些遊說工作可以透過各種人際關係多管齊下，其中包括在教廷中得到教宗重用的樞機主教或是教宗親戚等。于斌認為合適的樞機人選是陸徵祥，他曾是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，妻子去世後，入比利時布魯日的本篤修院隱修。以謝壽康為主的中國駐歐外交官，則以為最適合擔任樞機主教的是于斌自己，但于斌有自知之明，他這時年方四十四歲，為當樞機主教還太年輕；他的愛國立場，更常是外籍傳教士向教廷抱怨的內容。教會內的法則是，誰想得到高位，常常得不到高位。

1945 年 12 月 18 日傳信部次長剛恒毅總主教向謝壽康要陸徵祥履歷，一時之間大家都以為教宗要選陸徵祥為樞機主教了。但 12 月 24 日消息公佈，教宗選

擇了青島主教田耕莘，為第一位亞洲及中國樞機主教，方若翰神父的《田耕莘樞機傳》稱之為「第一位有色人種的樞機主教」。當時羅光任駐教廷使館顧問，親身參與其中的公私運作，在 1946 年 4 月寫了一封信給于斌，信是這樣寫的：

……事前，謝公使按照主教所定計劃，極力為興老（按：陸徵祥）奔走。……迨消息宣佈後，次彭公使向教廷探詢，據說教宗此次選任樞機之原則，在選各國之主教，且興老在國外多年，頗不足代表中國教會，故未被選。但我等都以為，既選中國主教，則名正言順，應為首都主教當選樞機，教廷方面聲稱，南京主教尚年輕，他日當選之機會正多。然其中確實理由，必為傳信部作梗。聖部以為中國第一任樞機，應為眾心所歸，而南京主教頗受宗座代表與傳教士等之攻擊，為敷衍各方，乃選一位誠樸之中國主教。

這封信的前面都對，但論及田耕莘的部份，則只能說是他們不認識這位誠樸的主教。正是因為田耕莘在陽穀及青島代牧區，充份展現了他克服困境的能力，這才是在眾多中國主教中拔擢他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他小心與政治劃清界線，當然也是他被考慮的因素之一。

田主教在 1945 年 12 月 29 日接到電報，一開始的反應是不相信。楊傳亮神父撰寫的《田耕莘樞機主教傳》，稱其當選樞機是「福星高照」，怎樣也想不到的事。田耕莘又接到同時膺選樞機的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的邀請，請他到美國再赴羅馬。這時美國海軍已控制青島，因此田耕莘是在 1946 年 1 月中，坐著美國軍艦前往美國西岸，再搭乘飛機，經愛爾蘭到羅馬。因為田耕莘第一位中國樞機主教的身份，國民政府也想派專機送他去羅馬，但開始找他時，他已在美國軍艦上了。這其實也滿符合田耕莘盡量不接觸政治的原則。

1946 年 2 月 18 日，庇護十二世在祕密御前會議正式宣佈新樞機名單。2 月 19 日，田樞機晉見教宗，贈送教宗的禮物非常具有象徵性，「山東花邊桌布一套」。2 月 20 日教宗授予樞機小紅帽，3 月 3 日接受拉達路（Via Lata）的聖母堂為在羅馬的座堂。在中國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中國聖統制的建立，亦歸功於田樞機的提出申請，但實際上在 1944 年 9 月于斌訪問羅馬以後，即開始醞釀此事，建立中國聖統制以及請教宗任命中國樞機，是于斌推動本地教會進一步發展，新教會結構中一體的兩面，不可能設立了中國樞機，結果中國的教會仍是代牧區體制。因此田耕莘只是恭逢其盛，因樞機位尊，故由其領銜提出正式的申請，但事前磋商是由中國駐教廷使館，以于斌為首的一批中國神職，以及教廷官員共同商議許久而成。

中國聖統制按照中國行政區劃，將中國分為二十個教省，每一教省設一總主教，其次有七十九位主教，四十三位宗座監牧。參與協商過程的中國神職最初期

望，二十位總主教皆由中國人擔任，但這個期望不太符合中國教會現狀。1946年3月底，田樞機領銜向教廷表達，希望南京、北平、漢口、廣州四個總主教由中國人擔任，在1946年4月11日成立中國聖統制的命令中，只公佈了于斌改任南京總主教，北平、漢口、開封、南昌、福州總主教的名字並未公佈，廣州總主教則由原來的廣州代牧巍暢茂（Antoine Fourquet）續任。5月10日公佈了由田耕莘樞機擔任北平總主教，同日公佈原任北平主教滿德貽（Paul Montaigne）辭職的消息。對田耕莘而言，這是合理的安排，身為中國樞機，他的教區位階至少應和南京一樣。但另一方面，法國遣使會就不一定喜歡這樣的安排了。7月18日，原保定主教周濟世轉任南昌總主教，因此在二十個總主教中，教廷將北平、南京、南昌給了中國人。

田耕莘在1946年6月1日回到上海，受到比在羅馬更熱烈的歡迎，國民政府方面此時才與這位中國樞機第一次見面。相關的拜會活動多由于斌安排及陪同。結束這些世俗活動後，田樞機趕回青島，稍待數日後即前往北平，在1946年6月20日接下北平總教區。這應是當時中國教友人數最多的教區，有二十五萬教友。

這位樞機主教按照他已有的教區經驗治理北平總教區，但他此時已有樞機主教的高度，讓他說話更直言無諱。在方若翰神父的《田耕莘樞機傳》中，說他對一些外籍傳教士有所批評，他也更換了許多人的職務，「這種轉變也帶來緊張和不諒解。」同時和許多傳統的主教一樣，他親手控管經濟事務。在教會外，更大的問題是國共內戰，他曾向記者表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，既然不可避免，他曾說最好早些開始。現實的處境是1947年就因內戰爆發了嚴重的難民潮，如何處理難民，變成了田樞機不得不面對的難題。教友們則在觀察著這第一位中國樞機，北京人的優越感，很容易讓他們對說話有濃厚山東腔的主教打折扣。他講的道理，也不一定適合城市的教友；與人說話，又少了彬彬有禮的修飾。雖然大家仍然尊重田樞機，但質疑的眼光也從來沒少過。

#### 四、流放

田耕莘在1948年6月離平赴滬，理由是治病，他的心臟逐漸不堪負荷，又有白內障及青光眼，但北平沒有好醫院嗎？他在離去前，指定獻縣教區的趙振聲主教為代理，與總教區的副主教李君武共負管理教區之責。在他離開北平之時，物價飛漲，反政府的示威持續經常的發生，過去一年中在中共日益擴大的控制區域，上百名神父修女被捕，在田耕莘看來，未來局勢是悲觀的。田樞機在上海聖言會會院暫居時，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（Antonio Ribeiro）在北平卻公開發表談

話，聲明所有的主教、神父，甚至神學修士都應堅守崗位。這是教廷的一貫決策，教宗庇護十二世自己本人在德軍佔領羅馬時，就是這樣做的。黎培理自己也是如此，他也如此要求所有教會成員。

1948年10月黎培理正式寫信給田樞機，要求其返回北平。但第二天田樞機接到副主教李君武的電報：「請您千萬別回北平，您回來只會使我們的處境更糟。」12月，國民政府高層也電請田樞機勿返北平，因為不能使中國天主教最高聖職代表落入共產黨之手。他將這份電報副本寄給黎培理，幾天後他寫信給教宗，表達自己情況的為難，並抱怨黎培理不顧情理的決策：

幾乎全中國的主教都想將那九百六十位的神哲學修士，和一些年輕的神父撤出中國，可惜，教廷駐華公使不准。……因此有人稱他是本地教會的創子手。我曾多次請求他召集主教們和修會會長們開會，但他卻不聽。他處理事情，儼然像全權掌管著中國的教會。

1949年2月耶穌會的蒲敏道神父告訴田樞機，教廷多數人贊成將神哲學修士撤往安全地帶，但另一方面，好牧人應該堅守羊群。筆者所認識的許多老中國神父，正是在這期間撤往歐美的神哲學修士。但田樞機自己呢？他要回到已被中共佔領的北京嗎？他這時住在香港道明會的會院，心中持續痛苦，猶疑不定。1949年10月，流亡至台灣的國民政府派飛機在香港接田樞機至台北，田樞機也決定去，在啟程前一晚，教廷在香港的代辦葛禮耕神父來看田樞機，宣佈教廷禁止他去台灣，並說他應在一段時間後，基本上是在健康恢復後，回到北平。方若翰神父說，田樞機此時繼續留在香港，不回北平的心似乎有些動搖，有人還給他送來了到天津的船票。但因朋友的勸阻，他寫信給周恩來也未獲回信，於是暫時打消了回北京的念頭。

1950年10月，田樞機在羅馬參加聖母升天定為當信道理的典禮，隨後轉往美國芝加哥郊外泰克尼（Techny）聖言會的會院，作為他以後八年的隱居之所。這絕對是教廷對田樞機的指示，雖然沒有任何文件或回憶文字為證。當年年輕的聖言會士都喜歡提田樞機的謙遜，他遵守會院中的規矩，和大家一起排隊用餐，按時起床、祈禱。

于斌在抗戰結束到1949年間，四年中也有歐美的「國民外交」行程。他在國內時也有許多非教會行程，又要替全國各教區服務，剩下在南京教區的時間，大概只有一年半，這也難怪一些南京教區的神父，抱怨他們的主教外務太多，沒有好好照顧百廢待舉的南京教區。大概到1948年底，于斌判斷國民政府已屬強弩之末，其時已有撤退南京教區年輕神父及修士的計劃，但黎培理不准，他亦無可奈何。其時，他又奉蔣介石總統及蔣夫人之邀，赴美作遊說工作。1949年4

月他在美國聞中共即將渡江，急電龔士榮神父率年輕修士出逃，他們這一群神父修士搭上一艘自上海往廣州的貨輪，臨時轉往基隆靠岸，這些神父修士遂在基隆跳船，來到台灣。

由於于斌公開為國民政府奔走，因此中共在 1949 年 1 月即宣佈視于斌為戰犯，意即若于斌回到中國，會立刻被監禁牢中。在這情況下，要求于斌回到南京是沒有意義的。其實當時在教廷有一批于斌的友人，在此情況下，試圖給于斌在台灣安排位置，方法是將台灣監牧區一分為二，北部交給剛恒毅設立的本地修會主徒會，南部則仍為道明會管轄。由於主徒會是年輕的修會，不見得有適合的主教人選，就讓于斌以署理的方式，管理這新成立的台北監牧區。主徒會士郭若石在 1949 年元月即來台，4 月時更是大批主徒會士來台，在台北長安東路成立會院。南京教區神父來台後轉往台中，似乎在主徒會與南京教區神職間已有分區傳教默契。在 1949 年 7 月底，于斌來台，經台灣監牧區陳若瑟監牧同意，將中部以北地區劃為台北監牧區。這時于斌突然接到教廷方面通知，命其立即離開台灣，其時或許于斌亦被命令回到不包括台灣的中國，因為于斌曾寫信給羅光，告知他在結束年底的南美之行後，將返回雲南或四川工作。

無論如何，國民政府全面潰敗的速度超乎預期，于斌連雲南或四川也去不成了。在不能去台灣，中國又不可回的情況下，教宗准許于斌在美國居留，或更好說這是教宗的命令。兩位不能回到自己教區，或者也可說是不願回到中共控制區域下的教會領袖，只能幽居美國。于斌得到史培爾曼樞機的邀請，得以在紐約從事「皈依中國人的工作，特別是知識階層。」于斌也確實從事這項向在美華人知識階層福傳的工作，余葆樂撰有《于斌總主教對留美同學講演集》，是 1953 年間于斌的福傳筆記。

在田耕莘相對沈寂之時，于斌顯得活躍不少。1950 年 7 月他到羅馬朝聖，探望南京教區在歐洲念書的修士，然後往西班牙協助推動中華民國與西班牙復交。1952 年 5 月，又到巴塞隆納參加國際聖體大會，在此次行程中，又對中西復交進行遊說，他的遊說顯然很有效，因為 1954 年西班牙政府以敦促邦誼，贈于斌「聖雷孟柏納福大綬勳章」。

1954 年 2 月，于斌以國民大會代表的名義，來到台灣參加正副總統的選舉。除了選舉的官方活動外，此趟返台行程每日演講、拜會、茶會不斷。27 場次的演講活動中，內容以反共為主，其次則是宗教為對抗共產主義的真正力量。教廷希望于斌在台低調短期居留，但教會內外報刊登載了他逐日精采的活動及言論，怎能不使人生氣呢？

在結束兩個月台灣行程後，于斌未立即回美，先經過韓國漢城，謁見了他多年好友韓國總統李承晚。回美後沒待多久，7月再訪西班牙。1955年于斌的行程更多，或許是教廷禁止，他沒再來台灣，但二月去了菲律賓，一個半月後去了越南，當時任總理，以後擔任總統的吳廷琰，也是于斌的多年好友。不久之後在越南成立了「自由太平洋協會」，這是于斌組織，經吳廷琰支持的反共團體。在短暫回美後，十一月于斌五度往訪西班牙，然後到了西德，這趟行程中最重要者為拜會西德總理艾德諾（Konard Adenaur）。這些行程中穿插了一些宗教性的活動，但其實多半都是政府支持的「國民外交」。

教宗庇護十二世對這些過多的「國民外交」很有意見。于斌希望能面見教宗解釋，但教宗屢次拒絕了謁見的申請。1956年8月，中華民國駐教廷使館幫于斌申請參加了一個在羅馬舉行的主教避靜。活動結束後，于斌與參加避靜的二十餘位主教一起謁見教宗，據羅光回憶：「教宗看了照片，就將于總主教的部份劃掉。」教宗應該在此後對於斌下了更明確的禁令，不准其離美，甚或不准其離紐約。1957年南京教區所屬的方豪神父在于斌紐約寓所見到于斌，方豪說：「其時公心情之沈重，精神之苦悶豈外人所能知乎。」

當于斌1957年在美近似坐監時，教廷卻准許了田樞機來台。事情的起因是有傳言稱田樞機準備回中國大陸，此事無風不起浪，雖然田樞機一再否認有此想法，但此話出自於田樞機身旁之人，可以猜想具有一定的準確度。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於謁見教宗時，遂當面請求教宗准許田樞機來台，教宗稱田樞機「常川駐台恐不可能，一俟其康健恢復後，可准其回一行。」經過一番波折，教廷最後必須為教宗說過的話負責，准許了田樞機訪台。

為了避開暑熱，田樞機在1957年9月13日抵台，隨行有羅光及魏欽一兩位神父。其實他來台近兩個月的行程，性質與1954年于斌訪台時差別不大，都有許多參觀及拜會活動，只是田樞機確實有病在身，活動密度不如下于斌。他說話的山東腔，演講精采或許不如下于斌。但以他樞機的身份，全台灣教會及政府對他的歡迎，則與于斌並無差別。其中在9月22日三軍球場（按：位於總統府對面）舉行的中興彌撒，號稱有萬人前來參加，是1950年代台灣教會的第一盛事。雖然看起來兩人在台行事風格及態度差別不大，但或許是沒人告狀，田樞機從此解禁了。他離開台北後經菲律賓直奔羅馬，在聖言會的總會院中撰寫他的訪台報告，然後庇護十二世在1957年底接見了田樞機，隔年1月田樞機拜會教廷各部會，這些拜會當然都是有象徵意義的。

## 五、在臺灣的新生活

1958年10月底護十二世去世時，田樞機也因車禍躺在西德的醫院裡。他手臂及肩胛骨骨折，認為自己大概不能參加新任教宗的選舉，但各方敦促他參加的信件不斷來到，認為他是傳教區的第一位樞機主教，應該盡量把握這難得的機會，於是他勉為其難的，為了滿足各方期待，參加了此次教宗選舉，選出了若望二十三世為新任教宗。

若望二十三世決定讓流亡的田樞機和于總主教都到台灣來，這看起來不同於庇護十二世的決定，其實背後並無差異太大的對華外交政策，有所差異的只在時空環境。一方面中共的宗教政策並未因教廷的小心翼翼而有所改變，另一方面在此時刻將兩位中國教會領袖放在美國，怎麼看都不合理。但要讓這兩位教會領袖到「自由中國」的台灣，必須要給他們適當的位置。教廷於是決定請台北的郭若石總主教讓位，由田樞機「署理」台北總教區。「署理」的原因是田樞機北平總主教的頭銜仍然合法，因此只能署理。這是田樞機第二次讓原來的總主教讓位。于斌則獲得了準備復校的輔仁大學校長的身份，教廷當時將輔仁大學的復校，當成是重建中國教會思想堡壘的重要工作。

1959年12月20日田樞機正式被任命為台北署理總主教，此時他已六十九歲，一目已盲，一臂骨折，復有日益惡化的心臟宿疾。寫田樞機傳記的方若翰認為田樞機人生中一直有「不稱職感」，認為自己不配擔任如此高位，沒有在一些困難的事件發生時，例如留在北平或離開北平，做出正確的決定。被任命管理台北總教區，田樞機似乎已擺脫了這種不稱職感，他在離開美國前，鼓勵那些已在美國開始工作的華人神父們，放棄在美國相對舒適安逸的物質生活，和他一起到「自由中國」。他到羅馬後，也對在羅馬的華人神職說：

此次聖座要我工作，我很高興，我願意工作，願意死在任所，……等我回到台北後，要有許多國籍神父回國工作，可能在生活、居處方面許多不便，但是我們要用克苦精神去克服他。

在教廷的鼓勵及田樞機的號召下，的確不少在歐美的年輕華人神父，在1960年代返臺服務。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是台灣教會成長的高峰期，教友人數增加到三十萬人，一切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像。只是這些成就大部份說不上是田樞機的功勞，在他管理台北總教區前，十年中各個曾在中國傳教的各修會，帶著他們充足的人力及財力，經過與郭若石總主教的簽約，開闢一個個堂區。因此田樞機經營的台北總教區已粗具規模，他大致上是蕭規曹隨而已。其次，他擔任台北總主教時正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召開之時，再加上為教區各項事業籌募經費，

一年中有許多時間在國外活動，能為教區服務的時間有限。第三，田樞機確實是老且病，精力日漸衰弛，他雖盡力從事，但已有些力不從心了。

于斌負責的輔仁大學也不是容易復校的。籌設及維持大學的經費非常龐大，要從何處籌措，是一大問題。其次是教廷命聖言會、耶穌會及中國教區神職，共同辦理學校，這些教會單位如何合作，是第二個大問題。大學成立，必須得到政府核准，雖說政府已經表示歡迎輔大在台復校，但政府內部不斷有人對輔仁大學的宗教性質提出質疑；購置校地時地方政府皆表示願意協助，但多半是另有圖謀。

在這些問題中，教會三單位的意見不一是影響最大的，原本耶穌會及聖言會商議妥當，在高雄成立輔仁大學的法學院及理學院，但因購地不成，在 1962 年方同意三單位在同一校區中共同復校。在 1962 年以後的購買校地過程中，多方的土地捐客，彼此破壞一塊塊合適建校的土地。最後在 1963 年初，終於買下了台北近郊新莊一塊工業區中的一塊土地。這塊土地方正，但地勢低下，迄今仍是逢大雨必定淹水之地。

對於于斌總主教來說，輔仁大學校長是他在台灣立足的身份，但他的活動能力是遠遠超過校長層級的。在他的記事本中可以看到，他到輔仁大學處理校務的時間有限，他的主任秘書龔士榮神父忠心的幫他處理各種瑣事，重要的事向他報告，重要的文件請他簽署。于斌在台北社交圈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各種人際關係和活動，不能說他是蔣中正夫婦的常客，但蔣夫人日後擔任輔仁大學董事長，就是此種人際關係的結果。于斌在美國紐約的「中美聯誼會」此時繼續運作，大致上一年中于斌也有數月在美，繼續從事他的國民外交。他和非常多的美國政界人物關係友好，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 1961 年後擔任眾議院議長的麥考邁克（John McCormack）。此時他在美國又成立了一個「亞洲演講團」（Asian Speakers Bureau），四處演講宣傳反共思想。他也和羅光一樣，當選了梵二會議大委員會的委員，經常必須到羅馬開會，雖然沒有教區，但這時的于斌仍是忙碌於各種工作中。

在台北總教區有兩個以耕莘為名的機構，一是耕莘文學院，此機構由耶穌會規劃籌款興建，其實與田樞機沒什麼關係，但他基本上是樂觀其成。雖然田樞機沒有出國念書，但他在任北平總主教時，就邀方豪神父主持上智編譯館，代表他確實是重視教會的文教事業。另一個以耕莘為名是醫院，他計劃籌設一間為窮人服務的醫院，他先在新店買下一塊地，開始準備醫院的藍圖，並且向歐洲募款。但到他去世為止，耕莘醫院尚未蓋好。

## 六、田樞機逝世與于樞機被選

1964年12月22日田樞機發生了嚴重的心肌梗塞，差點奪去他的性命。在榮民總醫院住院六周後，轉往嘉義教區虎尾的聖若瑟醫院休養，以後就再沒有回到台北。1965年5月9日安童儀（Ildebrando Antoniutti）樞機主教訪台，特別到嘉義去看田樞機生病的情形。田樞機口頭向安特使表示請辭台北總主教，安樞機將這個消息帶回教廷，但田樞機正式的辭職信一直沒有寄到羅馬。他正式辭職的日期一說在1965年底，一說是1966年2月15日。無論如何，教廷在1966年2月19日宣佈田樞機辭職獲准，同時宣佈由台南主教羅光接任。

退休養病的田樞機雖然行動不便，但精神尚可，意識清楚。他仍每天過著規律的生活，固定的舉行彌撒、祈禱、誦念玫瑰經。由於眼睛看不清楚，須有人為他誦念聖書，因此人們知道他特別喜歡《師主篇》及王昌祉神父翻譯的《耶穌傳》。退休後的一年半，1967年7月24日，田樞機逝世於嘉義聖瑪爾定醫院。

1969年3月28日，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（Luigi Accogli）請于斌往使館一晤，因為1968年3月于斌曾心臟病突發，故艾可儀兜了幾個圈子後，方說出教宗任命于斌為樞機主教的訊息。教宗為何在此時任命于斌為樞機主教，要從幾方面來說明。

首先于斌是大家公認的中國教會領袖。在1946年第一次出現中國樞機時，就有不少人為于斌抱不平，認為應是由其膺選。在田樞機去世以後，各方都認為應該再選一位中國人樞機，而于斌仍有強大的活動力，教宗挑選于斌是順理成章之事。

另一方面，于斌過度的活動範圍，「和政治太靠近」，一直是他被批評之處，也是可以不選他的理由。熟諳教廷政治的羅光因此認為，于斌不會被選為樞機，若要選一位代表自由中國的樞機，他自己是當仁不讓。但保祿六世選擇了于斌，這可說是教宗自己的因素，保祿六世和庇護十二世一樣，都是有全球視野的教廷外交家，但和庇護十二世不同，他比較沈穩內斂，對弱小國家更具同情心，按照多年與其來往的羅光意見，他和剛恒毅是教廷內最同情中國教會的人。因此他能了解于斌和田耕莘不能回到自己教區的理由，他不會將于斌視為不遵守教宗命令的主教，基於于斌對中國教會及普世教會的貢獻，選拔于斌為樞機是還他公道。

保祿六世在現實外交中，也很注意平衡性。他雖然譴責共產主義，但他也正視其長期存在的事實，因此他在1964年後就主張與共產國家「對話」，這當然也包括中國在內。但在期望與中共進一步交談之前，保祿六世同時維持並增進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，因此他在1966年底將駐華使館由公使升為大使。到了1968

年他致函聯合國秘書長，要求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並且讓中共加入聯合國。實際上保祿六世這時是在進行「兩個中國」政策，希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被承認，兩者互不影響，因此，于斌在 1969 年被任命為樞機，也可被認為是此種平衡外交的一部份。

1969 年 4 月 21 日于斌搭乘飛機前往羅馬，準備接受樞機主教的祝聖。在他的記事本中找到了他在飛機上寫的一首打油詩，其中最後四句是：「宗座寬仁不我棄，戰慄惶恐感恩隆。弼教救人視唯為，虔祈母佑主寵豐。」從這詩中可以看出于斌想起他神職生活的經歷，心中充滿了感慨，保祿六世這位不我棄的教宗，以樞機尊榮還了他公道，他心中想的是如何能在以後繼續從事弼教救人的工作。

### 七、于斌樞機的弼教救人及挫折

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于斌並不順遂，聖言會及耶穌會方面，在和于斌所領導的中國教區神職間，經常出現各種摩擦。即使是中國教區神職，包括主教和神父，也對於于斌逐漸產生了怨言，他們固然敬佩于斌的人格及理想，但對他的用人及空中樓閣則很有意見。于斌升任樞機主教後，正好給聖言會及耶穌會一個擺脫于斌的理由，因為樞機位尊，大學校長位置太小了，他只適合當「教廷監督」或「董事長」。這兩個修會的想法得到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的支持，於是在 1970 年發生了逼于斌辭去輔大校長的事件，但在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、外交部及蔣夫人的干涉下，教廷推遲了于斌辭職的命令，於是于樞機才能繼續擔任輔大校長。

另一個明知不可為的事是台灣的中華民國處境。世界各國基於經濟及政治利益，先後承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，宣佈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。協助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國際地位，是于斌此時期「國民外交」的主要任務。他在 1969 年升任樞機後，返回台灣前先繞道美國及加拿大。在麥考邁克的安排下與尼克森總統一起吃下午茶，希望美國能堅持反共立場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這樣的談話，反應的是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已有改變。1970 年及 1971 年他皆有美歐之行，主要是為聯合國中國代表問題奔走。1971 年 10 月 26 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，取得聯合國席位。在于斌的記事本中載：「國恥紀念，……予主盡人事，聽天命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」

這些挫折中的任一個，或都將使人意志消沈，于樞機此時期勞心勞力，確實也使他經常生病，進出醫院，但我們仍可看到他在規劃許多的活動，嘗試推動社會及教會的改革。他是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」的重要參與者，他為此運動提供許多思想上的意見，並使基督信仰在此運動中有容身之處。簡言之，于樞機相信基

督信仰是與中華文化相合的，天主給人的恩寵是一視同仁的，並不因接受基督宗教較晚而有所差別，因此他畢生致力於在中華文化中實現基督信仰。他所訂定給輔仁大學的校訓：「真善美聖」是在中華文化中實現基督信仰的關鍵字。他升任樞機後，身體力行，推動「祭天敬祖」，成為台灣天主教的一項特色。

在救人方面，于樞機心裡想的是「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」。這個成立在 1966 年的組織，要結合眾人之力，推動一些社會福利工作。在各種工作中，最核心的其實是私人的醫療保險，平時定額小量付款，或是初期繳納一定金額，日後在生病時可享受足夠的醫療服務。在這個醫療互助的計劃中，蓋醫院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，而買土地是建醫院的先決條件。于樞機本身是沒有錢的，但由他擔任董事長的康寧互助會向銀行貸款時負責人是董事長，當錢的周轉出現問題，付不出銀行的利息時，銀行就會向于斌追討。這個過度樂觀，另一方面多方人馬試圖從中謀利的計劃，由於利上滾利是于樞機晚年最傷腦筋的事。某種意義上說，也傷害了于斌的聲譽。

1978 年 8 月 2 日，于樞機依依不捨的將輔仁大學校長的職務交給了羅光總主教。一時之間，他僅安排了一個休閒的行程，但突然得到了保祿六世去世的消息，於是急忙束裝出發，到羅馬去參加新任教宗選舉。于樞機當時認為這又是一個良機，他又在計畫遊說眾樞機，希望能選出一位反對共產主義的教宗，但他勞心勞力的身體支持不住了，在 8 月 16 日心臟病突發去世。他去世時教宗尚未選出，形式上說于斌也有被選資格，因此其喪禮形式和教宗一樣，同時有九十三位樞機主教參加了他的喪禮。即使是去世，于斌也是如此耀眼。

## 八、結語

雖然這兩位樞機主教看起來有很大不同，但他們有許多共同點。他們都是十幾歲領洗的新教友，一般來說這樣的教友很少能被同意參與神職的培育，更別說獲得高位。他們雖然一耀眼、另一內斂，但在天主教本地化的立場上，他們都真心服膺剛恆毅及雷鳴遠的見解。于斌雖然常遭外籍教士批評，但他與田耕莘都能與外籍教士共事合作。他們也都因為反對共產主義，在 1950-1960 年代，支持帶有獨裁色彩的國民黨政府。

另一方面樞機主教雖是教宗之下教會內的最高榮銜，但這兩位樞機都並非無缺點之人。從教會內的觀點，他們離棄牧職雖屬情有可原，但在他們內心深處，則莫不是時時揪心之痛。于樞機固然能力超群，但過多的政治關係及人際活動，是一直被部分教會內外人士批評的。于樞機的另一大缺點是開始了許多大計劃，

但經常用人不當或陷入財務困境。

田樞機自認與于樞機相較是善於理財的。方豪神父在其所撰〈田耕莘樞機傳〉後補記：

公長於理財，接任青島主教時，值二次世界大戰戰火蔓延，教區負債累累；迨離任時，不僅債已還清，且留下鉅額基金。蓋得力於某李姓教友，為之購德國顏料。此公親為余言者。就任北平總主教後，又委李某攜鉅款，至台灣購一日人所遺化工廠，幾盡被吞沒，終至涉訟。公對民國以來二鉅公，不善用人，深表婉惜<sup>2</sup>，而公晚年亦卒以此致台北教區蒙受重大經濟損失；又以疾病纏身，辭總主教職。……

自認善於理財的田樞機，其實在北平及台北都栽過跟頭，按方豪說法，他最後辭台北總主教，亦與此相關。這其實是說田樞機亦不善理財。或者更可以說，任何理財辦法，教會經營都不適用。反過來說，在世時常有爭議的于樞機，在他過世三十四年後，我卻在眾多老教會中國神職中，得到了眾口稱譽的印象。在信仰的標準中，他們早就忘記那些失敗的事業，記得的卻是他無私奉獻的動機。

施予仁（Bartley Schmitz）神父是田樞機的英文秘書，在一本以照片為主的田樞機的書中，他撰寫了一段給田樞機的頌詞：

是的，你沒有特殊的才能，  
但你成為輔仁大學的促成者及董事長。  
你也沒有語言的天才，  
卻能給千萬人深刻的印象，使他們感動，深深銘記神的「真理」。  
你不是個創造者，……  
你不是世人所榮譽稱頌的外交家，……  
你不善於言辭，……  
你開始是一位鄉村傳教士，……  
你受苦於閃光燈，……

施神父不曉得是有意還是無意，他所描述這些田樞機的弱項，其實正是于樞機的強項。但施神父意在以凡人的軟弱，來展現天主的剛強。在這兩位教會領導人中間，不管生前或是死後，這些比較其實經常出現，但我們能比較伯多祿和保

---

<sup>2</sup> 這兩位鉅公，指的應是雷鳴遠及于斌。

祿嗎？漁夫與飽學之士在天主手中的重量是一樣的。施神父的最後一段話，為這兩位流徙一生的中國樞機都適用：

你立志一生為天主服務人羣，  
如今，你同受苦的主耶穌基督在天國享受永生。